



摘 要: 以转型社会作为宏观思考的背景,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进行了重点梳理,提供了一种于转型过程中所希望获得的,并有利于构建多元有序公共交往格局的参考性意见。对于文化现状的反思或许可望导致一种观念上的转向,以便能以更为成熟,沉着的智性来处理人们在当代及未来所将面临的各种问题,透过对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重建二者的分析,提供文化重建的具体方略,谋求文化上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社会结构;转型;文化重建

Contemporary China's Social Restructuring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YANG Hui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s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to the background of macroeconomic think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focused on the status of the order, to provide a transition process in the hope that access, and will be conducive to building multi orderly pattern of public exchanges of information and views. The culture of the status quo may be expected to lead to a reflection on the concept of the shift in order to make more mature and calm to deal with the intellectual we will be contempora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various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social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wo, thereby providing the specific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strategy for the cultural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social structure; transition;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所谓社会转型,是指整个社会系统由一种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结构状态过渡,它不是社会某个部分或层面的局部发展,而是社会系统的、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社会转型

以结构转换为核心,同时带来社会体制的转机、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的变化等方面的发展。就中国目前的历史现状分析,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然而,现代性的吊诡告诉我们: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正在进行之中(远远没有完成),而且进行得步履维艰。其突出的特点是政治转型远远滞后于经济转型,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杂交性,它既不是典型的政治社会,也不是典型的市民社会;既不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又不是典型的工业社会;既不是典型的前现代社会,也不是典型的后现代社会;中国的经济既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中国的文化既不是原先的政治文化,但也远非成熟的市民文化或商业文化。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21世纪人类之间发生的冲突,根本原因将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由此可见,文化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在通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的冲突将是人类各种差异之间最根本的。

时至今日,中华文明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儒教文化”在信息时代被迅速地卷入“西方文明”的洪流,我们的文化正在成为附庸,我们的文化日益开始迷茫。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我们的内圣能否开出新外王已经成为一种燃眉之急。

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分析

从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现代化则成了中国被迫面对的历史选择。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国人曾进行过各种尝试,从林则徐到洪秀全再到康有为以至孙中山,有识之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至今日,现代化却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但在今天看来这只不过是浅层次的,只停留在物质技术层面,人们往往过多地追求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的存在。当前,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文化现代化以及人自身的现代化又重新被推到历史的前台,中国也开始由片面的现代化走向总体性的现代化。

放眼世界,人们已经开始对后现代的关注,而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参照系统的复杂性而使得我们对文化的选择步履难艰:既要现代化又要反现代化;既要世俗化又要反世俗化;既要工业化又要反工业化;既要发展科技,又要反对科学主义。国人难免开始迷茫,但是由于我们一方面处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同时又位于反现代化的包围之中(相比之下,西方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反现代化的声音尚未产生)。因而我们必须在世俗的诉求与宗教的诉求、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感官(经验)享受与终极关怀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那么压力与艰辛看来就难以避免了。由此看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已经不再是思想上的启蒙和理论上的呼吁问题,而是正在进行且必须尽快实现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继续推向前进、引向深入的问题。时不我待,由于全球化的推动与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文化的重建过程已不是文化本身,它是整个中

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伴生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对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格局作一整体的把握,就无法解释清楚中国文化所呈现的新状况,也根本无法解决文化的依附性现状。

让我们考察一下西方世界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在西方走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展现出内在的引力,它们相互一致,并构成了以理至上、人性至善为核心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从而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人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

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这种历史错位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特殊的历史定位。而这对于中国文化的构建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如果回望几百年欧洲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文化观念的确立,从直接成因来看,是通过欧陆近代史上三大文化变革得以完成的。这三大文化变革即是尽人皆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被恩格斯誉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文化精英,他们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之名,倡导和弘扬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他们反对一切神,反对禁欲主义,主张人的现实幸福;反对迷信,要求意志自由;批判蒙昧主义,倡导智慧和科学。从根本上看,文艺复兴倡导了以个人本位的人本精神和科学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精神。

宗教改革是对正统基督教的一种创造性变革。正统基督教认为,人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获得拯救,人必须压制自己的现世欲望,奉行禁欲主义,通过教会并不断向上帝忏悔。宗教改革把人从来世又带回到现世。人的现世行动被肯定,逐利被允许并被赋予一种终极价值。那种被韦伯称作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实际上打造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文化和价值理性。

启蒙运动仍然强调以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为主要基调,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称为“理性时代”,一切都在理性面前受到无情的批判。以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弘扬了一种法制精神和契约思想。可见,此时,人已经彻底觉醒了。

这三大文化变革运动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主要国家的精神文化走向,并融入欧洲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信念之中。我们说,文化精神一旦介入现实社会,它便会成为实际力量,成为历史的杠杆。正是这些精神启动了欧洲近代的文化,促成了欧陆的社会转型。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精神的催化,恐怕也就不会有今天灿烂的欧陆文明。

中国要建成工业文明,实现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状态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实现政治体制领域的民主与人本思想,文化在其中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时下的中国同样需要有这种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生成,需要对文化进行重新构建。

1. 当代中国文化的依附性

近些年来,人们普遍所感到的一点,即是面对与身处的人文景观已今非昔比。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社会的合理性已不再仅仅依赖于意识形态的辩护而主要有赖于对系统的合理性技术性调节,这造成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物质实力的大大加强,共同体个人的潜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掘。而反映到当代文化之上的变故却带来了深刻的震荡。

过去意识形态出于对各领域的统摄性要求,不仅对理论思想(也包括经济活动)领域起着规范性作用,而且也因此承担了与之相关的对文化的监护与养育权,而意识形态的相对避匿则使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文化的保护权,而这又恰恰是在所谓的“文化自主”、“文化走向市场”的理论名目下进行的。由于手段的一致化,同时也使得更多本无生存活力的文化形态也一起处于自生自灭的放逐中,面临基于性质上决定了的无法承受的考验,以致大批原已建立的文化设施、文化社团纷纷涣解,甚至那些肩负着重要文化使命或国家文化建设使命的组织为取得自我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只得改换门庭、调整方略,以适应带有明显经济目的的生存竞争,并同时导致大量优良人才资源的流失。而那些在各层次上发育起来的权且称为“高级文化”的东西(包括主体文化、探索文化、经典文化等)又迎面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重创。

相比之下,在此残颓的背景下,代之而起的是消费文化在一种感官放松与娱乐需求激增情况下的骤然兴起,虽然对之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种种辩护,但从目前发展与呈示的样式来考察,其基本上处于一种丰富与无序并存的状态。因此,对于文化做价值上的认定往往会抹煞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差异,那么必然会使教育、训练、智力及深度精神体验等内容一概纳入怀疑论的视野之中,将所谓的“现代文明”理念框架完全虚幻化、虚假化,文化的发展反被大规模低层次上的制作行为与认同心理所支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消费文化就不应当有自身甚至是在范围上的进一步开拓,但从它目前所表现出的无序与低浅看,恐怕连消费文化概念的维护者们也难以具体解释,而只是停留在抽象的词语赞美之中而已。而且,事实上由于它在客观上也常常是以“高级文化”的对立面——一种消解力量出现的,这样也就自然形成了与后者在文化资源上的竞争,加之以上所述原因,必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促使文化朝低浅化、粗俗化沉降。虽然最近的趋势得到一些控制,但只要这种失重以及文化自身的素质得不到改变,当代文化也只能处于表征繁荣而内在荒芜的恶性悖立的局势之中,这种替代性满足是难以掩盖实质上的空虚的。

事实上,由此而引起的已不仅仅限于对原有文化的冲击,而且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态度的感知方式与表述方式。一些人希望用经济救赎来解决当今的文化现状,从而使经济介入文化领域,虽然动机有所不同,或出于文化理解,或出于文化利用,而经济活动的本性又决定了绝大部分考虑会从文化利用的角度出发,而在无控制的情况下这种投入便仍主要是促使消费文化一极的兴盛,从而使文化进一步向投合低浅兴趣的方向倾斜,这已为近几年的事实所证明,黄赌毒等低级文化又沉渣泛起。而在对待高级文化的态度上,大多数经纪人看中的仍然是改造这种文化原有

功能之后,如何使其文化价值转移为有利可图的交易性价值,即完全以市场机制运作方式处理高级文化的消费。此刻,文化往往被看作是对商业的诠释,并完全处于一种隶属的地位,文化的原义则已被抽取或扭曲了。

以上分析了当代文化在运作方式上的依附性现状及隶属性地位,实际上在美学趣味上,文化内涵也不是朝一种更高的方向作自身的提升。取得世俗认同的愿望甚至也支配了一些曾经颇有成就的艺术家、学者,常常决定改换门庭,淘空自己原有的文化素养,去接近那种固有性或拟想固有性的世俗社会心理,以求得后者的同情与理解。而文化却失去了主体方面的立场,也失去了站在其外作为指导者、传播者或有关故事的编造者的地位。固有性压倒了超出性,从众心理压倒了主体心理。文化失去了自我,文化开始了迷茫。

2. 对于文化重建的一些参考性意见

文化,就其广义而言,是指人的一切创造物。但从狭义上看,它是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与价值认同。按照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阿兹的理论,文化都是自成一体的,各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特殊的别具一格的文化。中华民族在其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一种自在的未分化状态;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表现为血缘关系、宗法等级关系。处在文化显学地位的儒家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畏天命,重视人伦道德;道家文化则强调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奉行超然于物外的出世主义道德理想。在这种文化精神基础上,形成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如亲情观念、家庭观念、乡土观念等等,这些传统文化美德是我国的优秀遗产,但从另一角度讲又不适合转型社会对于文化的需求。

在传统文化环境之中,我们便养成依靠经验和常识,忽视科学和理性的培养。而市场经济却需要科学和理性,崇尚自由和法制,但是我们却还不能走出人情和特权的困扰。正所谓过去的紧紧地托着现在,死去的东西仍在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我们社会结构转型步履维艰了。

由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并且深刻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化的时代氛围内为其进行重新定位。实际上,这也是与文化重建以适应我们时代需要的文化模式密不可分的相关性问题。这种新的文化模式必定是合于现代性的,所以,其主导性精神也应是科技理性精神、人本精神和现代法制精神的统一。而那些传统文化也并非在一般意义上与现代性相违逆。其中,有一部分可以获得新生,正所谓“内圣开出新外王”,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可以与现代文化理念并存,任何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都不会与传统完全割舍。但是,对于那些与决定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的,在社会行动和社会实践中我们必须予以摒弃,同时自觉地接受和构建新的价值观和文化伦理观,让文化成为催生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并且在此过程中克服文化的滞阻力。

对于这种新文化的建构,应该首先拆解传统文化,南怀瑾先生写了《论语别裁》,对这部“东方圣经”给予重新构塑,赋予其以时代特色。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才是保证我们的文化重建顺利实施的根本途径。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所兴起的文化加以中和和融通,构建转型时期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才是结构转型顺利推进的根本所在。

文化的重建是文化对于自身的超越而凝铸的生成过程。

四、余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一只凤凰为了寻求新生而投入熊熊烈火之中。我们的文化也应投入时代的大潮中求得新生。21世纪呼唤着新的和谐的文化理念产生,转型期的中国呼唤着新的和谐关系的产生,国人也呼唤着今日的孔子降福于人类!古老的东方文明在转型社会应该翻开新的一页!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已经时不我待!在Internet覆盖下的中华文明又一次面临生死抉择!

参考文献

- [1]陶东风. 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
- [2]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3]房宁.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4]袁方.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5]张敦福. 现代社会学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6]王铭铭. 想象的异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7]克利福德·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8]鲁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责任编辑:张鲜华]

作者简介

杨辉(197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文档附件:

编辑: 文章来源: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年第3期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 敬请注明: 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